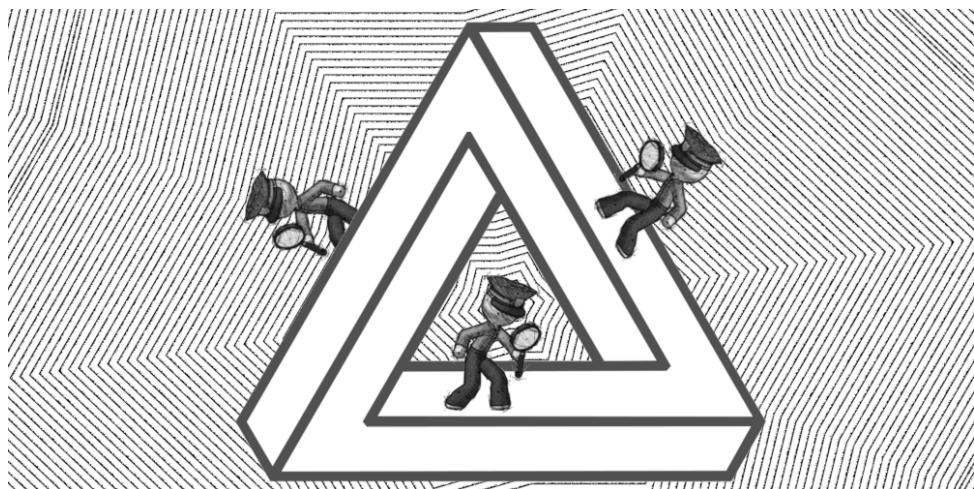


警察调查无政府主义 直接行动时的挑战



警察调查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时的挑战

原文为英语

Challenges of Police Investigations Into Anarchist Direct Actions

No Trace Project

2025 年 8 月 22 日

简体中文（普通话）翻译

Athene Noctua

排版

No Trace Project

<notrace.how/cmn-Hans/blog/challenges/tiao-zhan.html>

设想一下，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在策划一次非法的、匿名的直接行动。比如，他们想在墙上涂鸦，砸毁银行或者烧毁政府建筑。警察的目标是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和/或者识别并逮捕作出这种事情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收集足够的证据对他们提出上诉。警察，基于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资源、行动的类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形式，如何达成这些目标？他们会面对哪些挑战？无政府主义者又如何识别并利用这些挑战，在不被逮捕的前提下行动？

本文致力于通过对近年来，我们认为，没有在无政府主义文本中得到足够讨论的话题进行探讨，以回答上列问题。

目录

基线监控	4
对无政府主义团队的调查	6
行动之后	8
平衡镇压和尊重“人权”	10
最后的备注	11

基线监控

“登记系统就是我们的记忆。要让系统知晓你所收集的信息。那些塞在书桌抽屉里的笔记，也许丰富了你个人的知识，但并没有丰富情报部门的知识。因此，务必要确保信息被登记在案！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回答部门里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人是谁？我们对他知道些什么？”

— 摘自瑞典情报机构 Säkerhetspolisen (国家安全局) 1953 年的一项指令

甚至在无政府主义者开始策划行动之前，他们可能就已经受到监视，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被怀疑曾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他们的名字或许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名单上，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受到监控，他们的 DNA 被录入数据库，线人或渗透者会参加他们的会议。这种基础监视通常由负责收集和分析信息，以支持警方工作的情报机构执行。警方数据库记忆力极佳，他们收集的信息可以保存数十年。

情报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情报碎片化，即不同机构或机构内的不同部门掌握的信息各不相同，且彼此之间信息共享不足，导致分析不够理想。造成这种碎片化的主要原因是保密性：机构需要对目标和公众保密其工作。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泄密风险，信息共享受到刻意限制，包括通过安全审查、部门划分以及按需知情等方式。例如，地方警察局可能不知道，线人可能提供有关当地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信息，因为雇用这个线人的国家机构不信任地方警察局。情报碎片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机构间的竞争。由于战略或政治目标不同，各机构可能不愿彼此共享信息。例如，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优先进行长期情报收集，而联邦调查局 (FBI) 则优先进行导致起诉的短期调查。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一个机构可能也不与其他机构共享信息：也许预算削减即将到来，而共享信息会削弱该机构向领导证明其价值，并避免裁员的能力。

情报机构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分析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如今，机器非常擅长执行一些特定任务，例如将一份 DNA 档案与数百万份其他档案进行匹配，或在数十亿份文件中查找关键词。但在许多任务上，它们的认知能力仍然不如人类，例如解决警方调查中经常出现的复

杂、新颖的问题。因此，情报机构仍然需要人工来分析他们收集到的大部分信息。

因此，情报机构必须与雇员的个人局限性作斗争。机构成员受到他们的智力、习惯和知识的限制，并且可能有与机构不一致的个人利益。例如，在2010年英国世界杯期间，一名研究员和警察监视小组进行监视行动。在等待监视目标离开他们的房子时，研究员与一名监视操作员一起坐在一辆车里，而操作员更关心的是在他的便携式电视上获得信号，观看正在进行的足球比赛，而不是监视。在他们的笔记中，研究人员写道：“警惕性处于历史最低点。我们以极慢的速度绕着停车场转，试图找到最好的信号。我把胳膊伸出窗外，试图把〔电视的〕天线固定在顶上。”

在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受到其内部普遍腐败的影响。腐败的机关人员和警察可能收受贿赂，伪造证据，徇私枉法处理机密信息，或者选择性地执行职务。他们可能更喜欢处理能给他们带来贿赂或晋升的案件，而避免需要大量时间和文书工作的案件。

对无政府主义团队的调查

“无政府主义团体——与他们的核心意识形态一致——拒绝权威。这反映在他们更横向的组织结构中，通常缺乏指挥或领导，依靠分散的集群和个人，通过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团结联系在一起。”

— 欧盟恐怖主义形势与趋势报告，2024

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计划行动。计划和执行行动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这个团体可能此前已经存在，也可能是为这次行动创建的。它可能在行动之后停止存在，也可能在未来执行更多的行动。它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它可能单独行动，也可能是几个团体协同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协调可能非常紧密，参与的团体一起计划和执行行动，也可能非常松散，参与的团体只是用相同的缩写签署行动声明，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结构流动性，和他们的安全实践，使他们相对警察的渗透相对有抵抗力。2005 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强调了渗透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挑战：“渗透到大型亲和团体中相对简单。然而，渗入激进的革命‘细胞’却不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疑心和安全实践使得渗透变得困难和耗时。很少有机构能够进行需要多年前期工作的渗透，尤其是在预算不断缩减、需要关注其他问题的情况下。由于生活方式的公共性质（在不断的观察和审查下）以及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掌握的知识，渗透变得更加困难，这些知识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时间来获得。”

亲密的亲和关系，有时友谊，把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参与者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对警察试图招募成员作为线人有一定抵抗力。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为了避免入狱告密，或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例如，非暴力立场的支持者告发赞成暴力策略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在暴力的威胁下，或者在实际的暴力下，或者是为了钱。一些警察和情报机构已经意识到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并正在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恐部门 2004 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通过密切审查潜在的线人和卧底特工，生态恐怖分子更有

能力挫败执法部门的成功渗透。执法官员应该 [……] 认识到生态恐怖分子密切研究执法策略、程序和政策。因此，创造性的卧底场景必须精心策划 [……]。”

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的冲突可能产生警察可以利用的断层，用于破坏组织的稳定。例如，关于使用暴力的合法性的冲突，可以被警察用来将无政府主义者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并促进他们的镇压。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某些国家的城市地区，有激进的左派，朋克，反法西斯或自治的场景。这些场景的存在可以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社会联系，和分享他们想法的机会，并可能有助于保护他们免受警察镇压。英国 2015 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关于收集暴力活动组织情报的挑战：“当和平的活动者有意无意地与暴力和活动者混在一起时，进一步的混乱和复杂性就会出现。当声称和平的组织，为准备实施犯罪破坏行为的活动者提供安全庇护所时，这尤其成问题。”

行动之后

“我们确实限制了对接触式 DNA 的采集。我们只把它用于暴力犯罪案件。我们很少通过接触式 DNA 得到结果。有时我们会，但很少。它不会像贴身衣服那样给你带来明显的效果。但如果是暴力案件，我们会愿意多走这一步。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资源——我们正在努力在检测中尽可能提高效率，合理使用资源和工作人员的时间。”

— 摘自 2018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执法局法证服务部门在一场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该会议由使用该部门服务的警察调查员参与。

无政府主义者实施了这一行动。警察到达现场，开始调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和几年里，警察可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识别无政府主义者，并收集足够的证据来定罪。也许他们可能根本不调查，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警察调查一项行动的动机，以及他们投入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

增加警察动机和资源投入的两个因素是行动造成的经济损失（例如破坏或盗窃的成本）和人员损失（对人造成了多大伤害）。此外，该行为的“潜在”经济或人员损失可能与其“实际”经济或人员损失一样有影响力。例如，由于装置未能点燃而没有造成损害的纵火案，如果该装置没有发生故障，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可能会像装置没有发生故障一样进行彻底的调查。

另一个因素是行动的政治背景。如果一项行动的目标是国家或警察更青睐的个人、公司或机构，如重要的政治家、大公司或警察机构本身，则可能会得到更彻底的调查。政治环境也可能造成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可能会促使国家加大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力度，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一系列针对公司的行动，可能会促使公司游说国家加大对针对它的镇压力度。例如，2019 年法国，随着反对工业化农业的激进行动增加，该国主要的工业化农业游说团体获得了一个新的警察部门的成立，专注于收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

最后，警察进行成功调查的能力当然取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一些警察机构意识到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采取先进的安全措施，因此可能会先发制人地增加分配，调查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行动的资源。英国 2018 年的一项研究指

出：“[国内激进分子] 对取证手段具有高度意识，这本身就足以正当化动用更接近严重犯罪侦查标准的资源，以提高侦破率，例如对案发现场的保护，以最大化证据提取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无政府主义网站和媒体报道的声称和未声称的直接行动的数量与无政府主义者被捕的数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估计，在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行动从未被成功调查过。

平衡镇压和尊重“人权”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 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 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 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拘禁或流放 [……]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以确保其权利和义务，及对其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得到公正审理 [……] 任何人的隐私不得遭到任意干涉 [……]”

— 《世界人权宣言》，1948

假设无政府主义者不幸被警方识别，警方现在必须选择如何镇压他们。这种选择通常受到国家对“人权”的相对尊重的限制。各国尊重“人权”的方式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局势、地缘政治联盟和其他历史因素。例如，同样的行动，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在西班牙被监禁，在俄罗斯遭受酷刑，在伊朗被处决。

一个国家对“人权”的相对尊重程度会影响警方的监控能力。例如，在中国和俄罗斯，利用公共闭路电视网络（CCTV）的面部识别技术识别通缉犯已非常普遍，但在西欧（还）没有普遍使用。

警察的镇压被认为过于严厉，可能会导致反弹。当地记者、联合国等政府组织或国际特赦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以负面报道的形式引起舆论的反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采取团结运动的形式，包括直接行动。例如，2022年，意大利政府决定将无政府主义囚犯阿尔弗雷多·科斯皮托（Alfredo Cospito）转移到更严厉的监狱。这一决定导致他进行了180天的绝食抗议，以及一场国际声援运动，其中包括对意大利在几个国家的外交机构的袭击。202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科斯皮托事件表明，意大利司法系统的高压手段极大地加剧了局势的升级。一如既往，适度的、不过分强调军事、并坚持民主原则和法治的策略应该成为每一项反恐战略的基石。”

最后的备注

我们已经讨论了警方在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行动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如何将这些挑战视为弱点，以便利用它们并采取行动而不被逮捕？这里有一些建议。

要知道，情报机构进行的基线监控可能不全面、不尽人意，有时甚至不符合警方的最佳利益。他们并不了解你的一切。他们可能对你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有大量权力、金钱和工具。

要明白，组织结构的流动性和牢固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安全好处。创建基于亲和力和信任的分散群组。尊重“知情必要”原则，即一个人只能访问完成其工作所“必需”知道的信息，而不是一切他们“有权限”的信息。

在团体内部的冲突被警察利用之前解决它们。有些冲突太深而无法解决：允许团体改革和分裂，不要强制团结。

确定您与其他政治场景的关系何时以及如何对您的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你的安全可能需要你撒谎或隐藏你的真实意图。根据你的，而不是国家的原则决定你愿意做什么。

评估警方调查你行为的可能动机和资源，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研究过去的镇压行动。在进行大规模行动之前，考虑先进行小规模行动的演练。在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尽量减少留下可能追溯到你的痕迹。决定你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你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可能后果。

考虑到警察活动受到国家尊重“人权”的相对需求的限制。

警察并非无所不能。你可以出其不意，你可以击败他们，你可以逃脱他们的追捕。愿勇气、力量和好运常伴你左右。

无痕计划（No Trace Project）

设想一下，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在策划一次非法的、匿名的直接行动。[……]警察的目标是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和/或者识别并逮捕作出这种事情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收集足够的证据对他们提出上诉。警察，基于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资源、行动的类别，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形式，如何达成这些目标？



No Trace Project / 无痕，无案。这是一个工具合集，旨在帮助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反抗者了解敌人的能力，削弱其监控手段，并最终安全地采取行动，不被抓捕。

基于您的情况，持有某些文件可能被定为犯罪，或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请谨慎选择打印哪些小册子，以及将它们存放在哪里。